

第一章

西安事变发生的起因和条件

西安事变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虽然从事变的发生到事变的解决，只经历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但它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事变本身，它不仅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由于事出突然，事前毫无任何征兆，特别是西安事变发动的主要领导人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再加上国民党当局有意封锁事变的真相，一时间，人们不知事变从何而起，不仅普通老百姓，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中央要员，在震惊之余，也茫然不知，人们只能从国民党的喉舌报刊的攻击和谩骂中、各种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和各种传闻中去推测事变的真相，特别是报刊上具有煽动性的所谓张、杨发动“兵变”的报道，更是对人们产生了强烈的误导。

从事变发生之日起，中外学者便对事变作了大量述评，这些述评有助于我们今天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但是，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对事变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大不一样。在西安事变发生的起因问题上，更是南辕北辙。中国共产党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国民党方面则认为西安事变是张、杨等受“反动派”的宣传而发动的

“叛乱”；苏、日则互相攻击，都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受了对方的挑唆和指使；如此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大量档案资料的公布和口碑史料的挖掘，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开始拨开了笼罩着西安事变的层层迷雾，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

毛泽东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①又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②根据这一原理，我们考察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不难发现，事变发生是两大矛盾激化和两大矛盾缓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变化的结果。

一、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尤来已久。早在 1872 年，日本便在美国侵略者的支持下侵略我国领土台湾，虽然没有得逞，但日本政府从清政府的赔款中尝到了甜头。从此点燃了吞并中国的欲火。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对外扩张、充当亚洲霸主的野心日益膨胀。1874 年，日本政府制订“征讨大清国策”，1927 年又出台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把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从 1872 年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先后多次发动或参与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较大规模的计有：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 年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1904 年日俄战争、1914 年以对德作战为借口，出兵山东强占胶州湾，1927 年又制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p301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p302

造了“济南惨案”。在这些侵略战争中，日本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特殊利益和军事赔款，形成了“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占中国的基本态势。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无论是腐败的清政府还是挂着“民国”空招牌的南京政权，都把人民的正义行动视为仇寇，竭力扼杀，对日本的侵略却妥协退让，屈膝投降，这就更加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气焰，终于酿成了“九一八”惨祸。

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部撤至山海关以南，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东北三千里河山，三千万同胞呻吟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①，不仅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前来调查东北事件。为了巩固既得的成果，转移中国人民和国际视线，日本政府一方面于1932年1月28日出兵进攻上海，另一方面扶助溥仪，建立伪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

日本对上海的侵略，遭到了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率领的第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坚持一个多月，打得日本侵略者数次增兵，三易主帅。但蒋介石政府屈于日本政府的压力，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逼迫十九路军退出上海，破坏了淞沪抗战。

1931年年底，日本特务土肥原将溥仪劫持到东北，1932年2月16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召开所谓建国会议，讨论肢解中国的方案，18日，宣布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准备建立伪满洲国，定伪都于长春。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溥仪粉墨登场，

出任执政。1934年3月1日称帝，建号“康德”。

日本侵略者通过上述两个措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自鸣得意之余，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热河。1933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内田康鸿在日本贵族院所作外交方针的演说中宣称：“满蒙与中国关系以长城为境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尤以热河省之属于满洲国之一部者，徵诸该国经纬，当可明了。最近热河境内，不仅时受扰乱治安之策动，而张学良下属之正规军，亦逾越国境侵入热河省。根据日满议定书之规定，对满洲国领域内之安全，两国有共同维护之责任。因此所谓热河问题，纯粹为满洲国之内部问题”。日寇要向热河动手了。

1933年1月3日，日本侵占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2月21日，出动十万日、伪军，分三路进攻热河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领所部东北军望风溃逃，日军如入无人之境，3月4日，日军仅126名士兵即占领了热河省城承德，热河失陷。日军并未就此罢手，而是继续南攻，于3月9日占领喜峰口，尔后长城各口相继陷落。5月，日伪军进攻察哈尔，多伦、张北、商都等地相继失陷。华北门户洞开，北平、天津处在日军的监视之下。

在严峻的民族危亡形势下，蒋介石依然坚持妥协退让的政策，于1933年5月3日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亲日派头目黄郛为委员长，准备对日交涉停战。但日本并不予以理会，于5月7日发动“关内作战”，进攻滦东地区，蒋军不战而退，自古北口至榆关皆为日寇占领。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黄郛却加紧求和活动，5月22日，黄郛与日本公使馆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日本公使馆书记官中山详一、日本公使馆驻北平武官平津佐比津晤谈，达成协议四点：一、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以南以西，今后不得有一切挑战行为；二、日军亦不超过上述之线进

击；三、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派正式任命之全权大员前往密云，对日本高级指挥官表示停战之意。四、以上正式约定之后，定某日某时作关于停战成文之协定。这一协定，得到了何应钦与蒋介石的认可，以此为基础，5月31日，中国代表熊斌、徐燕谋等6人与日本代表冈村宁茨、永津等7人签订了《塘沽协定》，把华北置于日本的监视之下，埋下了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的祸根。

1935年5月2日，接受日本津贴的《国权报》社长胡恩溥被枪杀于日本租界内的北洋饭店，3日，振报社长白逾桓被枪杀于天津日租界白宅内，日方认为，此“乃系国家组织或有力团体所为”，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挟。尔后又以国民政府援助孙永勤抗日义勇军、违反塘沽协定、妨碍停战区之内之治安为由，向中国政府提出无理要求，迫使南京政府派出代表何应钦与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酒井隆、高桥垣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侵略者窃取了河北省、察哈尔省的部分主权，迫使国民党军队部分撤离华北，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均离开天津，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往保定，国民党驻平津一带的中央军撤往陕西、河南、安徽等地，平津完全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成了一座“孤岛”。

蒋介石想以妥协退让换得暂时的苟安，以卑躬屈膝的和平谈判作为解决中日矛盾的主要手段。1935年7月28日，蒋介石召见归国述职的驻日大使蒋作宾，嘱其向日本传言：“只有强者事弱，然后乃有真正同盟，无威胁而成之同盟”。据此，蒋作宾通过新闻媒体表示：“中国政府并不因一些不愉快的事而变更改善中日邦交的政策”。^①蒋作宾于8月30日返回东京后，于9月7

日开始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晤谈，探讨解决中日矛盾的途径。对于中国政府伸出的和谈之手，日本政府把它看作是不战而从中国攫取更多权益的绝好机会。10月7日，广田以秘密外交方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所谓“三原则”：（1）中、日亲善，中国不提再借欧美势力牵制日本；（2）、中、日、满亲善和经济合作；（3）、中、日、满共同防共。对此，蒋介石表示“同意”。^①1936年1月21日，广田在日本贵族院演说时，公布了“三原则”。

“广田三原则”成了日本侵略者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行动纲领。与广田三原则出笼的同时，驻华北的日军又策划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935年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声称，他主张立即实行华北五省自治。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冀东22县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作为华北五省自治的“先声”。1936年5月12日，蒙奸德穆楚克栋鲁以察北为根据地，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对此，南京政府无能为力，莫可奈何。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它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进一步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解决中日民族矛盾，成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迫切的、首要的任务。

然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多灾多难，外患未尽，内争不已。占据统治地位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定对内对外政策时，主次不分，本末倒置，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职务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公然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

① 《蒋总统秘录》 P49

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①这实际上是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仍然把国共之间的矛盾看作主要矛盾，因而使得蒋介石在国际国内事务中，把“剿共”当作第一要务。1933年，蒋介石在对“剿共”军事将领的训词中，把东三省和热河失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说什么“无论是在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的主义不能在东北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我们是不能负责任的”。他要求国民党将领“要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定长治久安的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的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侈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他扬言：“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是要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②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下，蒋介石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妥协退让，出卖民族利益，另一方面疯狂镇压人民革命运动，进攻苏区和工农红军，损耗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地破坏了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合作，削弱了国防力量，更进一步地加重了民族危机。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政府的对日妥协投降、对内血腥屠杀，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且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这就使得全国各阶层人民在抗日的旗号下可以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

①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 P5

②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 P6

义出中国，这是历史的潮流，只能迎，不能拒，逆历史潮流而动者，必然被历史所唾弃。张学良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刺激下，迅速清醒过来，摆正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位置，抛弃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与蒋介石分道扬镳，毅然举起抗日大旗，为历史留下了一席美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是促使张学良思想发生变化、发动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并不是唯一原因，如果没有其他客观原因的交互渗透和交互影响，也不一定会导致西安事变的发生。

二、局部抗战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

“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局部抗战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是促使张、杨政治思想转变和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民党当局一片妥协退让的言行中，爱国军民纷纷自动组织起来，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首先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是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1931年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的嫩江桥，马占山将军率全体将士奋起抵抗，揭开了东北抗日战争的序幕。接着，被打散的东北军将士纷纷自发组织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们纷纷聚集在马占山、李杜、苏炳文、丁超等的指挥下，最盛时达30万人以上。但是，由于这些武装分散作战，缺乏统一组织、统一部署和统一指挥，先后被日军各个击破。但他们的义举，鼓舞了士气，提高了全国人民对日作战的信心和勇气。随后，各种抗日武装、抗日游击队风起云涌，给日军以极大的打击。

1931年12月27日，日军进攻锦州，在敌我力量悬殊、孤立

无援的情况下，守城的东北军将士英勇顽强，坚守不退，凭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日寇周旋了一个星期。在锦州保卫战期间，守城的将士们悲愤地发表过两次宣言，强烈呼吁南京政府出兵对日作战。在 12 月 31 日的宣言中说：“日军三路取锦，血战五日，死伤枕藉”，“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其视我东北军将士，不过政治上理应送死之牺牲品而已”。在 1932 年 1 月 3 日的第二次宣言中说：“六日以来，数电中央，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锦州之陷在目前，回视枪中炮中弹药仅存数发。而中央所持为死守者，又只电文数纸”，“如此而谓其共赴国难，岂不念生者寒心，而死者瞑目乎”。由于弹尽援绝，锦州终于失陷。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进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盐泽狂妄声称：用四个钟头占领上海，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也叫嚣，只用三个月即可占领全中国。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将士在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的领导下，在上海人民的支持下，拒绝蒋介石撤退的命令，奋起抗击日寇的侵略，以四万兵力抗击日军十万之众，在一个月时间内，打得日本三易主帅，毙伤日军万余人。据当时上海英国人创办的《泰晤士报》记者报道：“华兵之抵抗力非常强，猛烈之炮火加于彼等，彼等屹然不动，当其阵地为炮火所毁时，彼等即以福枪兵士伏于其口，准备抵抗日兵之进攻，故日军终不能前进”。淞沪抗战虽然被蒋介石所出卖，但爱国军民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流血牺牲的爱国精神，激励着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同时，也沉重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粉碎了其四个小时占领上海、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从而鼓舞了中国人民战胜侵略者的信心。

1933 年 1 日，日军攻陷热河后，接着又向长城各口进犯。这时长城内外中国守军约 30 万人，从未接到出击的命令。当日

军进到长城各口时，第 29 军广大官兵先在喜峰口击退了日军的进攻，首战告捷，接着商震在冷口、关麟征、黄杰等在古北口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33 年 5 月 26 日，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通电全国，成立抗日同盟军旨在“团结军民力量，坚决抗击日寇，收复失地保卫国土”。6 月中旬，抗日同盟军召开军民代表大会制订抗日的具体方案。6 月 20 日，同盟军兵分三路迎击日伪，连续光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县，7 月 4 日，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率部进攻多伦，经过五昼夜浴血奋战，终于收复多伦，并乘胜追击，将日伪军赶出了察哈尔省。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胜利的消息传出，人心振奋，各地抗日救亡团体纷纷致电祝贺，积极捐献钱粮财物支援前线作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也士气高涨，准备于 7 月下旬进一步收复失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义举，却不见容于心胸狭窄的蒋介石，他以“破坏整个国策”的罪名，再次破坏了同盟军的抗战，迫使冯玉祥离开同盟军总部，方振武被迫出国，孙良城通电解甲归田，吉鸿昌则被杀害于天津。

局部抗战局面的出现，是国民党中部分爱国军人不满意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不甘屈服、不愿做亡国奴的表现，是国民党内部出现裂痕的反映。它表明，国民党内并不是铁板一块，在严重的民族危亡面前，国民党爱国军人会随时举起抗日的大旗，为民族的生存而战。但是，局部抗战还不能推动全国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现，全国抗日局面的出现，还有赖于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奋起。

与局部抗战相呼应，出现了全国性的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出现，一方面积极支持局部抗战，另一方面与国民党当局展开面对面的

斗争，促使国民党当局出兵抗日。群众性爱国救亡运动，在国民党当局的破坏和镇压下，虽经几起几落，但从未中断过。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组织各种各样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参加”，“抓住国内重要工厂尤其日本工厂进行组织反日的罢工，示威。同时各地党部团部也应注意学生中的工作”。^①在东北更应加紧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了给日本侵略者以直接打击，中国共产党派遣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如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进入东北，组建游击队、义勇军。1933年秋后，中共满洲省委将各地抗日游击队整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并联合义勇军余部和其他爱国武装，在南满、东满、北满、吉东建立抗日联军和抗日同盟军。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联合其他抗日武装，统一建制，改称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11个军，最盛时三万余人。东北抗日联军在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王德泰、冯仲云等的领导下，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坚持抗战14年，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4年6月和8月，中国共产党先后派遣红军第10军和第8军团北上抗日，但都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拦截，没有达到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动下，全国人民纷纷起来，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组建各种救亡团体和抗日义勇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南京政府的妥协投降。

首先起来的是中国工人阶级。9月24日，上海三万五千名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 P446 - 447

码头工人举行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搬运货物，使船只停靠码头无法开动。9月26日，上海各界市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有邮务、水电、卷烟、针织、棉纺、造船等各行各业100多个工会约10万人参加，通过对日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10月初，上海80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并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组织义勇军，颁发军械，对日实行经济绝交。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纷纷组织抗日会，自动退厂，实行不合作主义。在北平，10月18日，北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通过迅速组织义勇军、实行对日不合作、积极募集爱国捐款等决议。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太原、长沙等地的工人也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急先锋，它把局部抗战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结合起来，联系起来，起了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起，上海、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广州、福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学生，都先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罢课游行，组织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义勇军、日货调查团、抗日讲演队、军事训练班、看护训练班等组织，有的参军参战，抗击侵略者。9月下旬，各地学生络绎不绝地涌向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坚决要求抗日。9月28日，京沪两千多名学生冒雨向国民党中央请愿，他们冲破军警的阻拦，捣毁国民党外交部，殴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11月初，天津学生为抗议日本噶使匪徒在天津暴动，举行总罢课，并派代表南下请愿。各地学生闻讯而动，纷纷响应，到11月26日，全国各地到达南京的学生有2万余人，他们结队到南京政府门前，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抗日的时期。12月17日，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苏州、济南等地学生3万余人，汇集南京，向

国民党当局请愿，反对将锦州设为中立区。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民族资产阶级也行动起来，他们积极支持和参加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等爱国活动，上海市商会、汉口市商会、天津各行业、南昌各行业等纷纷表示“不买卖日货”“拒绝与日商往来”“拒收日本钞票”等等。代表资产阶级舆论的报刊，如上海的《申报》、天津的《大公报》、《国闻周报》等，也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开放党禁、开放言论、开放民众运动，一致对外。

对于蓬勃开展的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蒋介石政府采取了高压政策，通令全国各地各工厂一律不准罢工，停止举行各种爱国活动，严禁各校学生游行示威。上海市政府颁布“取缔越轨行动”的布告，对爱国人士公开叫嚣要“绳之以法”、“依法惩办”；上海市公安局更颁布“特别戒严法”，用军法来对付人民群众的爱国活动。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制造珍珠桥流血惨案，对学生实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打死学生 30 余人，重伤 100 多人。在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但是，人民的抗日怒火是扑不灭的，压之既久，其发必速，以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为起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又复苏起来。

1933 年 1 月，日军进攻热河。1 月 11 日，南京市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作出五点决议：一、通电全国一致誓死抗日；二、电张学良及华北将领积极抗日；三、向党政机关请愿从速收复失地；四、通告各工会会员严禁购买日货；五、函知各界抗日会积极检查日货等。1 月 15 日，北平、天津地区的工会通电国民党政府实行对日宣战，并要求战区附近工人组织自卫团体。2 月 26 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全国工友书，呼吁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厉行抵制日货，加紧抗日。全国各地工人团体，有的发表宣言，

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有的提出节衣缩食，捐薪抗日，正太路铁路员工购买“正太号”飞机捐给抗日军队。工商界、宗教界也通电呼吁抗日，五台山僧人发起组织僧界救国会，北平组织佛教青年救国会。1934年5月，由中国共产党起草，以宋庆龄、何香凝、李达等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呼吁：一、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立即设法解决抗日军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自卫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这个基本纲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签名赞成这个纲领的各界代表人物有李杜、马相伯、胡汉民、杨靖宇、李延绿、翁照恒等 1779 人，随即在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参加签名的人数达 30 万人以上。这表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形成了新的高潮，其标志是 1935 年 12 月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自“秦土协定”签订后，华北局势危如巢卵。“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严重的局势面前，国民党政府一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暂时的苟安。11月26日，国民党政府决定撤销北平军分会，并准备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王克敏、王揖唐等亲日分子为委员。国民党政府设立“冀察政委委员会”原本是考虑到在日本直接威胁下的冀察两省的特殊情况，谋求避开日本政府对国民政府的直接压力，使之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直接交涉，同时，也是试图破坏日本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但是，冀察政务委员会从开始酝酿起便处在日本的严密控制之下，从人员的任命到对日交涉，都必须事先得到侵略者的同意，冀察政务委员会如同一傀儡政权。这个政权机构当然遭到了人民的反对。

12月9日，北平学生六千多人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阻拦，举行请愿示威游行，他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的办公地点，要求何应钦出面接见，何慑于群众的抗日怒潮，早已躲了起来。参谋长侯成作出面接见学生，对学生的要求竭力推诿、敷衍，激起了学生们更大的愤怒，他们集结队伍从新华门出发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王府井、西单等处时，遭到军警的袭击，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军警的刺刀、大刀、棍棒、水龙头展开了英勇的搏斗，100多人受伤，30多人被捕。学生们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一曲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凯歌。

12月10日，北平学生实行全市罢课，以回答当局的镇压。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几乎所有大中专学校的学生都投入这场斗争，参加人数在一万人以上。他们与工人、农民、市民、小商民、东北流亡同胞二万余人汇合一起，在天桥广场举行市民大会，通过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一致要求：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组织民众、工农商学兵共同抗日；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华北自治。大会结束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国民党政府调动全城军警再次制造了流血事件，400余人被打伤，30余人被捕。

“一二九”运动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怖统治，给全国各阶层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后，各阶层人民迅速行动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抗议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镇压。

广州6千多铁路工人、上海邮务和沪杭甬铁路工人，先后召集群众大会，通电声援学生，要求对日作战。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各行业、各厂、各帮各派，号召他们召集群

众大会，发表宣言和通电，声援北平救国运动，组织救国会，共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上海 14 法团、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北平文化界、北平妇女界等都发表了宣言和通电，要求保卫领土主权、讨伐伪组织、停止内战、武装民众、出兵抗日。

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也表示拥护“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主张，许多工商业资本家联名通电要求抗日。

国民党元老尤烈发表通电呼吁：“同胞乎，中华民族乃人民国家，一切措施当以民意为主，断不能任令三五私人断送国土。烈甚望全国同胞，一致起来，督促政府，即下决心与敌周旋，烈虽鲁钝，仍本昔年革命之精神，以追随诸君之后”。

社会名流、学者马相伯、章太炎等也发出通电，痛斥国民党对日投降及丧权失地的罪责，对学生运动深表同情。马相伯在给复旦大学学生的信中写道：“日来诸君为国难而驰驱，餐风露宿，不遑宁处，余闻而大慰，……为诸君计，与其呼吁政府，莫如开展人民，街头巷尾，茶楼酒肆，皆诸君为国宣劳之地也，务使彼等晓然于自身力量与责任之所在，执戈而起，戮力前驱”。章太炎在给宋哲元的电文中指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者，但问今日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昔？”

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抗日救亡的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平津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妇女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等相继建立。抗日救国刊物，如雨后春笋，不下千百余种，如《大众生活》、《永生》、《现世界》、《中国呼声》、《中国农村》、《世界知识》等刊物相继问世。这些组织和刊物成了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发动全国人民的有力武器。

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不仅给国民党当局以极大的压力，迫使它不得不作出抉择，而且给张学良、杨虎城以极大的刺激和震撼，使他们迅速转变自己的立场，改弦更

张，走到抗日的旗帜下来。从而使张、杨与国民党当局的分歧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分道扬镳了。

三、中国共产党策略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这时，国共两党本应团结起来，捐弃前嫌、一致对外，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斗争。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置民族危机于不顾，调兵遣将，疯狂围攻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并竭力破坏和阻止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抗日力量，加深了民族危机。

中国共产党是“以民族解放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口号的提出者和实施者。“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及 11 月成立的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定，号召中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族“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3 年 1 月 17 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1 月 26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要求“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斗争。”各游击队不仅要建立下层统一战线，而且要“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统一战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满洲省委和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执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联合一切抗日